

◀ (上接10版)

‘第一等生业’,徽州许多人‘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章当六籍’。以至于民俗中‘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总之,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对商人和经商的宽容,使得社会上弃儒从商、弃农从商以及士商渗透渐成风气,从商者愈来愈众,极大地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商帮的出现,使得明清时期的商书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他们的需要成为商书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需求。以市场导向为主要宗旨的书商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纷纷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经商经验知识的小册子以及程图路引等,于是专门讲授各类从商之道及专业知识的商书应运而生。”

商帮的经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携带巨资前来收购优质棉布,是棉布业市场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

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丝绸业市场更是如此,闻名海内外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一日贸易数万金”,“阊阖填噎馥佻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以濮绸闻名的濮院镇,“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如此巨额的长途贩运,其风险可想而知。商书除了提示便捷的路径,还会告诫沿途注意事项。

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天下)水陆路程》第七卷,专门指引最为繁忙的苏州至松江、苏州至湖州、嘉兴至松江等水运路程,小标题是“苏松二府至各处水”,下面有两行小字夹注:“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意思是说,这条水路是棉布客商的必经之路,除了标明自苏州至吴江、平望、王江泾等各处码头的距离,还特地说明沿途的风险:“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

无虑”;“大船至上海,由泖湖东去黄浦,为外河,有潮、盗之防”;“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昆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沙船,怕风防潮。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过客无风、盗之念,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防。”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透露这样的信息:当年苏州、松江一带各地商帮云集,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优质产品运销到全国各地,业务繁忙。《水陆路程》作为商书,责无旁贷地提醒客商,注意选择安全的行商途径。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当时的市场经济规模不可小觑,吴中孚《商贾便览》记载了20个省252个府州总共1800多种商品,其中包括140多种新品种,还记载了日本、高丽、安息、波斯、缅甸、交趾以及大小西洋诸国的70多种商品。要应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此巨额的物流,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势必寸步难行,商书不可或缺的价值由此显露无疑。

隆庆元年,朝廷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准许百姓出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政府在东南沿

海的港口设置海关,征收进出口税,使得私贩贸易转化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的高潮。在贸易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始终处于逆差(入超)的地位,中国始终处于顺差(出超)的地位。于是乎,源源不断的白银货币,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入中国。在货币的银本位时代,这种白银货币是可以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这使得中国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识别这些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含量),也成为商书无法回避的难题。《商贾便览》的“辨银要谱”一节,有《辨银则例》《辨银名色》《辨银增要》等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介绍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之洋钱(西洋银元)”。《贸易须知》提醒商人:“近来江浙等省通用洋钱(即洋钱),有光毛真假之分,与看银之法同而不同。此系钱业专门,外行未必习此。凡收洋钱,务请内教人仔细看明,切勿大意,致有吃亏。洋价照市,或申或否;进出找钱,看货价之多寡,总宜细心合算,勿使有错,转受买主批

评。”商书与时俱进地为商人们打开了国际眼界,许多商人成为外贸人才,商书功不可没。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商人群体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日益注重商业伦理,讲求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诚实无欺、重恩守信,为传统道德赋予了时代特色:这是商书的共同特征,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客商一览醒迷》说:“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节俭而后丰”;“处人和则无争,家和则治强,四海和则万邦宁”;“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等书都提及买卖交易要讲诚信:“好歹莫瞒牙佻,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也。”《贸易须知》说:“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这样的商业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出版活动要立足于当下中国

陈莹

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学科知识的生产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集中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变迁轨迹。在当下语境中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既是回应新时代对哲学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也是该学科自身寻求创新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编辑出版学属于一门年轻的应用性学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出版物生产人才紧缺的现实问题,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部署与推动下,编辑出版学开始进行专业化、系统化、规模化的本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开始在部分院校开设。90年代初期,编辑出版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为学科的“合法身份”呼吁,在各方力量争取之下,1997年,该学科以二级学科的身份正式进入国家本科专业学科目录,列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已基本形成层次、规模、

地区分布较为合理的人才培养格局,在人才培养层次上涵盖高等职业教育、大学本科、硕士(学术、专业)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人才。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68所高校在本科层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28所高校开设出版专业硕士,8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李建伟、林璐:《中国大陆编辑出版学专业高等教育40年》,《中国出版》2018年第20期,第27页)只是由于学科专业一直没能进入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因此,一直以研究方向的形式挂靠在汉语言文学、传播学、信息管理、历史学等学科之下进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和限制着编辑出版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新时代,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与完善势在必行,一方面是回应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编辑出版学自身发展的深刻反思与再出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国家之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典籍修订

的工作,将修典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要国事。延伸开去,编辑出版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带有深刻的民族和时代的烙印。按照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中的观点,学科根据知识特征的不同,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应用软科学四种类型。这种描述从学科知识的生产特征、知识的外在形态、知识的功用、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的角色、知识生产流程与标准等方面对知识的特点分析归类,以此划分学科范围。从知识特征来看,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软科学,学科知识注重对流程、约定的把握,多集中于在大量案例的总结之上形成的共识,具有实用性,需要在实践领域检验知识的有效性,这就有赖于相关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有力指导。

出版物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双重属性,文化性是其根本属性。新时代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生产、传播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和

国家文明程度,繁荣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在世界舞台中形成中国话语的强大影响力。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关乎到生产什么立场的知识和培养具有怎样世界观、价值观的人的问题。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学科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将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作为统领学科发展的灵魂。

我国的学科制度移植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围绕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历来有诸多探讨。季羨林先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落后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在学术形式上没有与国际接轨。邓正来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问题有深入的思考,认为中国在引进西方学科制度时几乎是全盘接受,对制度的适用性缺乏基本的批判和反思,也并未从自主性的角度对制度加以改造。谈到对西方学术范式的遵循,华勒斯坦曾说过:“并不存在什么我们能够据以对知识结构的重组进行裁定的现成蓝图。”(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3页)

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

学的学术生产是不能脱离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根脉的。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讲,如何真正实现本土化才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本土化并不排除对西方优秀学术理论、范式的吸收和借鉴,但同时必须要将学科定位和学术研究的立场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实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对知识的影响和学科发展的促进。在知识生产中以中国概念作为基本单元,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体系,形成中国话语声音。最终,中国知识可以对世界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

编辑出版学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从编辑出版学的知识构成与学科发展看,核心的学科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滋生出来的,只是吸收了西方学术的概念、理论等。因此,编辑出版学与本土文化传统的整体性是不容分割的,学科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研究的先进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视阈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理路研究”阶段性成果)